

論匪俄關係的演變

蔣治平

壹 一般推測

匪俄關係，自一九六〇年公開發生齟齬以來，若即若離，變幻頗多。目前因俄共二十三屆大會定於三月二十九日在莫斯科舉行，適於此時，雙方論爭，趨於激烈，於是一般人的目光不期然投到了這個問題上。

推測匪俄關係的變化，根據近數年來各方所發表的意見，大致可分為如下幾種：

其一、認為匪俄爭吵，並非實情，而是出於策略上的一種運用。

其二、認為匪俄分歧，止限於思想理論的爭辯，不致演變成政治或組織的鬥爭，雙方對某些國際重要問題的意見，容有不同，但無論如何，總不致於鬧到完全分裂。

其三、認為匪俄所以發生爭執，主要由於彼此政策的分歧，在任何一方尚未就其政策的調整採取步驟以前，雙方關係只有愈走愈遠，鬥爭必致愈演愈劇。

其四、認為蘇俄正試圖圍堵共匪中。

上述四種看法，都有其理論上與事實上的根據。持第一種看法者，似以一九六〇到六二年間較多，其原因或許由於彼時匪俄矛盾揭露未久，以致對產主義要赤化全世界之前提着眼，以為匪俄原屬一體，本於同惡相濟之義，必無完全分裂之理。持第三種看法者，以往數年，便不乏其人，而以目前為較多，這可能是着重於對匪俄兩黨組織、歷史、理論、政策等的分析，從共產國際數十年糾纏不清之清算鬥爭，得出匪俄今日分崩離析之結論，於事有

據，於理自通。持第四種看法者，則為近數週事，即此美國副總統韓福瑞於一月十六日從訪問新德里返抵華盛頓所作之論斷。他說：「他相信蘇俄正試行在中共四週築起一道圍堵之牆，以親莫斯科的政權來包圍中共」。自韓福瑞論匪俄關係的談話公開發表後，各國報章，多有論述，如紐約時報於一月二十八日，倫敦衛報於二月二日，日本時報於一月十三日，先後發表專文，分析蘇俄年來在亞洲的外交攻勢，以支持韓福瑞的看法。於是在國際論壇上又立即產生了一種揣測，即匪俄關係是否又臨到了正式分裂的頭？

貳 十年分歧

要對匪俄正式分裂問題作成判斷，讓我們扼要敘述匪俄交惡的事實經過。如所週知，匪俄分歧，算來已有十年了，茲為便於敘述起見，姑分三個時期加以說明。

從一九五六年二月到一九五九年九月，這是匪俄由團結開始走向分離的時期，其肇因在於史達林之死及黑魯曉夫之掌權。一九五六年二月俄共舉行二十屆大會，決議清算「史達林主義」，廢除「個人崇拜」，推行「和平共處」政策，這幾項措施，在蘇俄共黨內部固然是翻天覆地之事，對於當時正在躊躇滿志的毛匪澤東，更無異當頭棒喝，所謂匪俄分歧即從此而來。當時毛匪一則因對這個突如其來的狀況，還沒有十分摸得清，再則對俄援盼望甚殷，依賴正切，故內心雖十分不滿，但仍不敢輕易表露出來。第二年，即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莫斯科舉行「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大會」，和「十二國社會主義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毛匪親赴俄京出席，在會上會起爭辯。次年

——一九五八年，共匪試行其冒險主義路線，貿然發動台海之戰，企圖在軍事上僥倖獲逞，並一面宣佈推行「人民公社」運動，想一躍成爲社會主義王國，豈料這兩件事都遭到慘痛的失敗，共匪將台海之戰的失敗謾過於蘇俄援助之不力，其「人民公社」運動，更會遭受俄共的責難。但這些當時並沒有十分明顯地吵鬧出來。到了次年（一九五九年）二月，俄共舉行第二十一屆大會，周匪恩來率團參加，黑酋報告影射共匪公社運動的錯誤，爲表安撫共匪，允予五十億盧布的技術援助。到了這年的九月間，毛匪對於黑魯曉夫竟和艾森豪會於「大衛營」，感到不耐，認爲這是「背離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的原則」的，而就在這時匪印邊界糾紛發生，黑酋發表聲明，表示「遺憾」，暗示共匪的驕武行爲是「可悲的」、「愚蠢的」，從此匪俄矛盾乃告暴露。

從一九六〇年六月到一九六四年十月，是匪俄關係進一步惡化的時期。起初共匪心中的痼疾，還是爲了那個「大衛營會議」，及由此而產生的「大衛營精神」。一九六〇年四月，共匪利用紀念列寧九十誕辰的機會，借題發揮，一連發表「列寧主義萬歲」、「沿着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和「在列寧的旗幟下團結起來」三篇文章，表面上雖說是「把鬥爭的鋒芒指向帝國主義和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註一）但實際是含沙射影，向俄共作試探性挑

戰。接着在同年的六月初旬，在「世界工會聯合理事會」北平會議上，六月下旬「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匪俄代表開始了面對面的爭吵。

「布加勒斯特會議」以後，黑魯曉夫開始向毛匪「施加經濟和政治的壓力」，廢除「幾百個」技術協定和合同，撤退一千三百多個工程專家及技術人員，將正在進行中之工程藍圖一併帶走，並指責共匪犯了「單幹」、「宗派主義」、「分裂主義」、「民族共產主義」等等錯誤。

共匪遭此慘重打擊，創巨痛深，怨憤難平，大罵蘇俄「不顧國際慣例，

背信棄義」、「惡劣地」「把思想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是年十一月，莫斯科召開「八十一國共產黨與工人黨會議」，匪俄雙方在會中有劇烈爭辯，最後雖然容納雙方意見，拼湊一個「莫斯科聲明」，但問題並沒有解決。

在「莫斯科會議」以後不久，蘇俄與阿爾巴尼亞的關係進一步惡化起來，雖然共匪對這件事推得一乾二淨，若無其事，但事實證明，小小的阿共所以敢公然反抗「大國大黨」俄共，完全出於共匪的從中唆使與支持，於是匪俄關係舊傷未復，新創又萌。是年即一九六一年十月，俄共舉行二十二屆大

會，蘇阿關係鬧到決裂，當然這也表示匪俄關係趨向嚴重。同時「俄共新綱領」在這次大會中獲得通過，確立了黑魯曉夫的思想體系，使毛匪堅持不捨的反黑鬥爭，大爲失色。在蘇阿關係決裂之另一面，則爲蘇俄與南斯拉夫之重修舊好，這在毛匪的心目中，更是倍增反感。一九六二年九月，匪黨舉行十中全會，大喊要堅持「反大國沙文主義」、「反新老殖民主義」，和「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意味着對黑魯曉夫路線的反抗，進入又一新階段。接着加勒比海危機突起，毛匪乃乘機對準黑酋反擊，扣以「妥協」、「投降」、「機會主義」等帽子。而俄共則利用匪印邊界糾紛，說「風涼話」，藉以稍煞匪之氣焰。

從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在短短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共匪一口氣發表了七篇文章，發動了又一次辛烈的論戰，這些文章的題目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列寧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分歧從何而來——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關於列寧主義在當代的若干重大問題」，「評美國共產黨聲明」。

當一個鬥爭高潮過去之後，匪俄雙方又回過頭來試圖言歸於好，這便是籌備數月幾經磋商而終於毫無結果的一九六三年七月五日的「莫斯科雙邊會談」。

同年八月，美英蘇三國部份禁止核武器試驗條約在莫斯科簽字，引起了匪俄間的新論戰，匪罵俄「出賣蘇聯人民利益，出賣社會主義利益」，俄則指匪是「戰爭販子」。緊接着匪又於同年九月六日起，至次年七月十四日，陸續發表其答蘇俄公開信之「九評」。

從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以迄現在，是爲匪俄鬥爭之第三時期。此一期鬥爭之特徵，厥爲黑魯曉夫被迫下台，共匪由指名對黑酋個人之謾罵，轉變爲對俄共新領導之攻訐。當俄共新政權成立之初，共匪也會頻送秋波，以冀莫斯科能在政策上改弦更張，但幾經試探，事與願違，於是「沒有黑魯曉夫的黑魯曉夫主義」等帶有敵意的名詞，在共匪的宣傳品上，俯拾即是。

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莫斯科協商會議」，在共匪堅決反對之下如期召開。三月二十三日匪發表「評莫斯科三月會議」一文，分別刊載於「人民日

報」及「紅旗」雜誌，指責此次會議為「分裂會議」，對俄共新領導課以「三假三真」、「四聯四反」之罪。與此同時，越戰因越共擴大攻擊而告激化，

詹森總統於四月七日宣佈採取「軍事政治雙管政策」，匪責俄「援越不力」

、「助美談和」。除於去年五月發表「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經驗」，「紀念

戰勝德國法西斯把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十月又發表「人民戰

爭勝利萬歲」等長文，強調「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必須與反修正主義的鬥爭結

合起來」。並於十一月十日及十二月三十日，又廣泛發表「駁蘇共新領導的

所謂聯合行動」，及「蘇共領導是宣言和聲明的背叛者」兩文，進一步把雙

方關係推到決裂邊緣。本月二日再度發表觀察家文章，以「蘇聯領導同誰聯合」為題，說「全世界人民決不會饒恕他們，蘇聯人民也決不會饒恕他們。

他們是逃不脫歷史的懲罰的」。至此莫斯科乃有召開國際共黨會議，公開予

共匪以譴責之議。

參 幾度協商

從以上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匪俄在其長期紛爭中，也會有過多次機會從事協商，藉以解決爭端，消除矛盾，這些機會是：

一、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莫斯科會議」；

二、一九六〇年六月「布加勒斯特會議」；

三、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第二次「莫斯科會議」；

四、一九六三年七月「莫斯科雙邊會談」。

以上三次會議，一次會談，除一、三兩次獲得部份協議，但仍未能付諸實施外，二、四兩次均屬不歡而散。我們從匪俄已經公佈之資料中，察知雙方對於第四次之「雙邊會談」，期望甚殷。如共匪於是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分歧從何而來」一文中說：「中國共產黨早就認為，現在仍然認為，兄弟黨

之間的分歧，必須而且應當根據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原則，在自己隊伍的內部，通過平等式的同志式的充分討論和協商，求得解決」。而蘇共中

央也於同年三月三十日的覆信中說道：「停止那些我們之間有不同見解的問題進行的不必要的爭論，不再發表那種不能緩和而只能加深我們分歧的公開聲明」。可見他們並不是有意要造成分歧，或有了分歧而不謀解決之道。

然而究竟是爲了什麼不能獲得協議，和有了協議又不能履行呢？且看他們所爭論的是些什麼問題：

「戰爭與和平問題」。

「和平轉變問題」。

「對核子禁試問題」。

「關於史達林問題」。

「關於南斯拉夫問題」。

「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黑魯雪夫修正主義問題」。

「關於黑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問題」。

這些被共匪看作是一系列問題的問題，都是從所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一個總題目所派生。其中心意思就是「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作為一切行動的「準則」。說得明白些，就是要「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採取「暴力革命路線」，消滅一切非共產主義國家，尤其要集中力量打擊「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因而「這條總路線」，反對從俄共二十屆大會及「二十二屆大會所產生的「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政策。

一言以蔽之，匪俄間的爭執，就是「和平路線」與「暴力路線」之爭。那麼「和平路線」的含義又是什麼呢？「和平共處並不意味着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之間的調和。……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和平共處，預計到兩個社會體系之間進行毫不鬆懈的思想、政治和經濟鬥爭；預計到資本主義體系國家的勞動者進行階級鬥爭，其中包括武裝鬥爭，當人民認爲它是必要的時候；預計到殖民地和附屬國民不斷發展民族解放運動」。（註二）俄共這樣委婉的解釋，仍不能改變毛共的主意，可見匪俄糾紛之結，是永遠無法解得開的。

肆 新情勢、新問題、新爭端

莫斯科、北平間的長期傾軋，不僅引起匪俄本身社會狀況和戰略地位的變化，同時也引起了整個世界情勢的變化。我們放眼世局，一種和往昔迥然不同的世界新情勢，呈現於每一個人的眼前。這種世界新情勢，無疑地主要

是由匪俄不斷的發生新問題和新爭端所形成，然而就某種意義言，此一世界的新情勢，却又反過來影響匪俄新問題和新爭端的產生。

當一九五六年匪俄交惡之初，彼時之匪僞政權，內而吹噓什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後來又搞「三面紅旗」等暴政，誇言要向「思想戰線」、「政治戰線」和「經濟戰線」進軍；外而高唱「一邊倒」政策，嚇唬外國人，也嚇唬中國人，而事實上，彼時韓戰結束不久，胡志明又在中南半島囊括半個越南，毛匪當時趾高氣揚，蓋可想見。但十年後的今日，「三面紅旗」失敗了，所謂思想、政治和經濟戰線早已潰不成軍，當然其中原因甚多，但俄共在思想鬥爭和經濟鬥爭中，予匪之打擊，實屬不小。

抑有進者，共匪近年來在外交上的節節挫敗，如亞非會議之鎩羽而歸，非洲各國之拒匪運動，以及在印巴戰場火中取栗落空，操縱越戰陰謀又不得逞，在在都與俄共有關，難怪韓福瑞要說：「蘇俄正在共匪的周圍築起一道圍堵之牆」。

那麼蘇俄呢？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五年的七年經濟計劃失敗，農業生產和若干重工業生產都未能達到目標，當然這與匪俄糾紛說不上有多大關係，但由於匪俄長期論戰，以致對其社會政治狀況，尤其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方面，當不無影響。不過從另方面言，蘇俄由於堅持其與西方

匪俄僵局的無法打開，是造成國際共黨組織由蘇俄傳統的一元領導，走

「和平共處」的政策，已使美國圍堵共產主義的重心，由西歐漸次東移，使向匪俄二元領導的主要原因，據說在世界九十一國共黨中，支持俄共者約有六十一個的多數，但也有十個的少數是以毛匪馬首是瞻。近年來，即自去年三月一日「莫斯科協商會議」以來，這種狀況已有跡象顯示將要有改變，即北越均將出席俄共二十三屆大會，至於印尼共黨，因十月政變失敗，幾致全軍覆沒，這對共匪打擊之大，實難以言宣。最近匪古關係，忽告惡化，據傳卡斯楚已倒向俄共一邊。總而言之，共匪在共產國際社會中影響力，亦已在逐漸消退中。

構成當前世界新情勢的另一特徵，便是由昔日的美俄對峙，轉變為今日的美俄匪相互鬥爭。柯錫金之主持塔什干會議，布里茲涅夫廉倫之行，以及謝里平之訪問河內，蘇俄的戰爭指標，無疑是指向北平的；可是克里姆林宮

今日在亞洲之外交攻勢，並沒有忘懷華府也是主要的假想敵。至於北平匪僞政權，固一面密切注意俄蒙軍事條約以及日俄航空協定的編訂，另方面又在帶着怨憤恐懼的心情，應付美國在西起印度東迄日本之間所形成的「新月形」包圍圈。

處於如此錯綜複雜狀況中之匪俄鬥爭，人們早已不應以單純的思想論爭目之，它已落入嚴重的政治鬥爭範圍了。具體言之，下列四個戰場的爭奪，便是匪俄間今日的新問題和新爭端。

(一) 越戰問題：自去年二月七日美機轟炸北越後，越局急轉直下，一天天緊張起來。四月七日詹森總統發動其和平攻勢的序幕戰，於是戰爭與和談便雙軌進行。共匪除一面痛罵美國玩弄「反革命的兩手政策」，同時埋怨蘇俄援越不夠積極，但又對俄假道運往河內之軍火，故意加以阻撓。去年三月四日，匪發動留俄外籍學生舉行反美示威，陰謀搗毀美大使館，此事鬧到兩提嚴重抗議，但均遭蘇俄退回。按匪之用意，在迫俄與美在越南直接交戰，最好因此導發熱核戰，而俄則利用越戰僵局，一則削弱匪對北越之控制力，一則藉此把美國拖在越戰泥淖中，以消耗美國之實力。惟其如此，所以匪俄關係的惡化，幾與越局的惡化成正比例。

(二) 印巴問題：印度與巴基斯坦為克什米爾問題於去年九月重起戰端，從問題的本質看，誠然是一個歷史糾紛，由來已久，但當此東南亞多事之秋，印巴雙方竟小不忍而兵戎相見，這與共匪之插手其間有很大關係。共匪對於喜馬拉雅山麓新勢力範圍之經營，早自其血染西藏始，前此匪印衝突，殆即受此種野心之鼓舞，乃甘冒不顧，窮兵黷武。其年來對巴基斯坦之故示好感，無非就是要實現其挑起印巴戰爭的企圖。可是印巴地區，緊鄰蘇俄之南疆，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匪俄此一勢力範圍之爭，勢必無可避免，而塔什干會議之所以召開，這便是一個主要原因。

(三) 「亞非會議」問題：「亞非會議」成為匪俄政治鬥爭的戰場，乃重要性不下於理論與策略之爭，因為這與共產國際二元領導問題是聯繫在一起的。共匪要排斥蘇俄於「亞非會議」之外，其目的就是想造成一個既可與莫斯科分庭抗禮的陣容，又可實現「亞非人民團結反帝」的局面。按第二

次「亞非會議」，原定去年三月在阿爾及利亞召開，嗣因故改在六月廿九日，但會前十日，即六月十一日阿爾及利亞突發生政變，會議前夕，會場又發生爆炸，因此會期乃再度延至十一月五日。其後匪因對這一仗的情況已無法作有效之控制，所謂第二次「亞非會議」終於告吹。從匪方宣佈的資料中，我們得知印度、菲律賓和日本代表與匪爭辯較多，而以印度最為激昂，由此不難令人想到「塔什干精神」，原亦由來有自。而彼時站在共匪一邊的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在未來亞非會議鬥爭中，恐要變換位置了。

(四)邊界糾紛問題：這是一個說來話長的問題，這裏只能扼要指出問題的本質，及匪俄今日鬥爭的形勢。所謂中俄邊界糾紛，乃起於俄共侵略中國領土慾的繼續和擴張。我們且看黑魯曉夫於一九六四年三月向一個外國記者講的一段話，便不難知道俄共處理邊界問題的真意為何。他說：「關於過去屬於中國，嗣在沙皇時代變為俄國統治的一大塊領土問題，依俄國人的看法，乃是我們繼承下來邊界之一部份，我們必須予以維持」。假如毛匪至今還在實行「一邊倒」政策，黑魯這番話便沒有說的必要。在匪俄公開反目後，俄共會罵毛匪犯了「民族共產主義」的錯誤，其實毛匪又何嘗有民族觀，今日在中國東北和西北邊境上形成的匪俄軍事對峙狀態，共匪不過是想藉此鎮壓邊疆少數民族不因俄共的挑動而進行抗暴或擴大逃亡，以免危及其偽政權的存在。如今新疆邊境頻傳不穩，而俄蒙新約亦已於一月十五日在庫倫簽字，並於二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正式交換，其形勢之日趨嚴重，豈待言喻。

伍 雙方的下一步驟

匪俄關係發展到現在，其矛盾鬥爭實已達到新的高潮，再往下走，究將演變到什麼程度，恐非任何局外人所能斷言。不過，從他們已往的行動規律，判斷其下一步驟，也許可以得到一些足資採信的概念。

就共匪而言，其既已走上魯莽殘烈瘋狂進之路，要想知難而退，也是退不了的，除了繼續加強其「人民戰爭」的備戰行動，藉以壯胆而外，其可能要做的事，不外：

(一)繼續對俄共發動思想理論鬥爭，以期擴大心戰效果。在大陸各階層掀起一個全面性的反俄運動，實已呼之欲出，據傳陳匪伯達已負責組織一

個研究機構，專門從事反俄理論之研究。

(二)繼續反對召開共黨國際會議，以加強離心運動，增加俄共之困擾。目前由波蘭發起的「國際共黨援助越共會議」，盛傳共匪業已拒絕參加。

(三)繼續推行其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之滲透顛覆活動，以與俄美作針鋒相對之鬥爭。目前這個鬥爭重點仍在東南亞，而以越戰為核心。

說到俄共的下一步驟，人們必想到，也就是本文開頭所說到的：匪俄關係正式分裂的問題。這個問題目前在莫斯科可以說是到了攤牌的時候，但俄共領導人此刻當在考慮兩個狀況：

其一、假如匪俄關係正式決裂，其對反美鬥爭之影響如何？在前述幾個主要戰場之角逐中，今日之蘇俄，可說正處於左右逢源之佳境，如一旦與匪正式決裂，則其微妙關係之運用，即告消失。美國今日雖已將共匪列為主要敵人，但對俄共之防範，並未放鬆。且看柯錫金在塔什干得手之日，韓福瑞雖在電視中說：「這件事幹得很好」，但不數日即有印巴之行。雖說舊金山會議後美國副總統之訪問亞洲六國，其主要使命在增強越戰，但不讓蘇俄在印度半島獨得「魚與熊掌」，當亦題中應有之義。當甘地夫人榮登總理寶座時，美蘇雙方固迫不及待的邀請貴賓往訪，就是嫌隙猶深的共匪，也有幾通電報致賀。總之，國際政治的微妙運用，以俄共之老謀深算，是不會不予考慮的。

其二、假如匪俄關係正式決裂，其對共產集團內部之影響又如何？共匪對破壞「莫斯科領導中心」，蓄謀已久，但不論如何，截至目前為止，他們還是藕斷絲連，繼續某種關係的往來，如果莫斯科斷然與其決絕，在俄共內部是否能取得一致同意下此決心呢？這是很難說的。即使俄共領導人下定決心，不惜以決絕行動表示其對共匪之厭惡，但其他各國共產黨是否也同意此一可能引起更大分裂之措施呢？歐洲十九個共產黨組織會議，於去年六月一日至三日在布魯塞爾舉行會議，其決議便強調「要永遠加強兄弟黨們行動的統一」。以一向主張匪俄爭之英共、波共、義共、及羅馬尼亞等，可能仍不會贊成正式分裂之議。

那麼俄共究竟將怎麼辦呢？

(一)變思想論爭為政治鬥爭：這是俄共新領導籌之已熟的策略。這個策略，和毛匪要「公開論戰一萬年」的狂語，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但與黑魯曉夫「和平共處」的構想，則又不謀而合。自去年三月「莫斯科協商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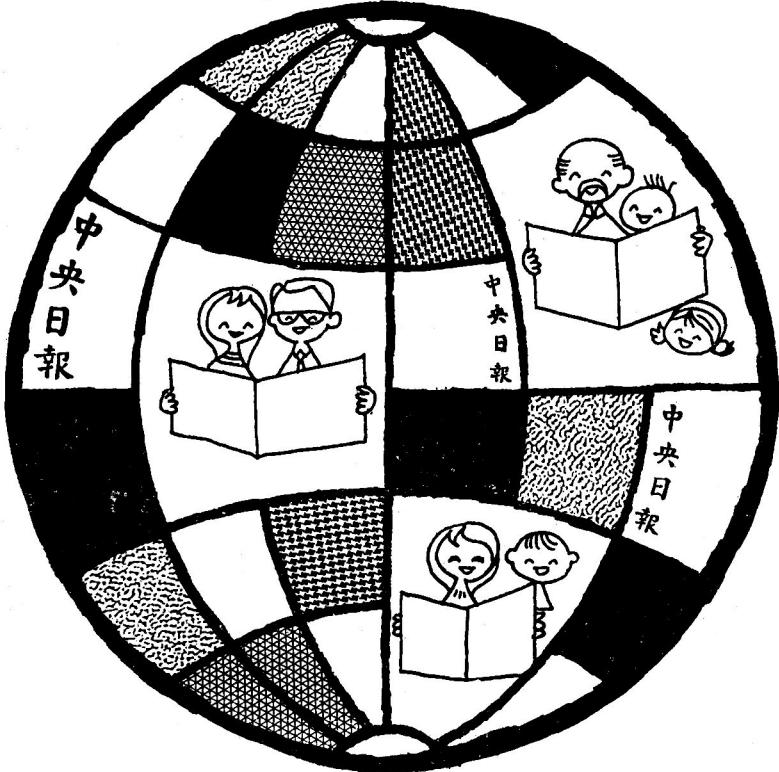
以來，俄共諸會即合力朝着這個方向走，目前已走出了一些眉目，今後還要繼續走下去，顯然塔什干是這條路上的一個里程碑，而俄蒙新約、日俄會談，也可看作是奔走出來的成果。共匪似已感到事態不妙，但力不從心，莫可奈何，便只有說說：「這些就是蘇俄領導人同美帝國主義在亞洲相互勾結的

新篇章」。

(二)譴責共匪的罪行，重振俄共的聲勢：這個步驟，俄共今日不但有可能，而且有此必要。因為長期以來，俄共對共匪的指責，實已感到不耐。俄共早就說過：「思想上和策略上的分歧，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被利用來作

為煽起民族主義情緒和偏見，煽起各社會主義之間的互不信任和糾紛的泉源。」(註三)因此在即將於三月二十九日揭幕的俄共「二十三屆大會上，發表一篇譴責性文件，指控共匪「阻撓援越」，和「破壞團結」的罪行，以說明其「和平共處」路線的正確，並為其變思想論爭為政治鬥爭，說出理由，尋找根據，引起共鳴，擴大效果，應是莫斯科今日反共匪「教條主義」和「左傾盲動主義」的既定之策。

世各界地都有中國人 方地的人國中有就 中央日報



號五九七一路正中市北台：址社
七五〇八二·三五四六二：話電

(註二)「俄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給中共中央的信」。

(註三)同前。